

立冬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2016年总第38期

目 录

1 / 卷首语： 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
叶半青黄

6 / 财政： 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三）

18/ 钱理群： 谈谈“民国那些人”

25/ 戴乃迭： 嫁给中国

37/ 大时代下的小背景

46/ 张季鸾： 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
肝胆

54/ 《赛德克·巴莱》 讲的是什么呢？

64/ 你为什么想要去讲他人的闲话？

| 卷首语 |

细雨生寒未有霜，
庭前木叶半青黄。



今日立冬。

“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
一点禅灯半轮月，今宵寒较昨宵多。”

（王稚登《立冬》）秋还意犹未尽，冬已悄然而至。春为始，冬为末，四季的更迭，似乎也走到了最后一轮。

冬是寒冷的季节，西风瑟瑟，却也凛冽得让人清醒。

在民国，始终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清醒且冷静的看待社会的变革。张季鸾就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

而时至今日，真正清醒地活着、心性坚定、拥有风骨的人，又还有几个？且在冬日里，于暖室中，或坐、或卧，闲听窗外寒风呼啸，早已模糊了岁月，模糊了内心。

克里希那穆提说过：“如果一个人真的希望认识生活的全部，那么他就应该怀有对自我的深刻认知。”而认识自我，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这需要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性剖析自己，悟透人生的苦役与况味，寻到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昨夜清霜冷絮裯，纷纷红叶满阶头。”深秋的红叶、初冬的清霜，拼凑成了一幅别致的冬日画卷。无论是重彩还是冷色，都是岁月不可或缺的一抹颜色。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这色调转换中，坚持自己的本心，清醒看待一切。

立冬之时，是为记之。



《读享·九州》| 编辑部

2016年11月7日





财政：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三）

时间：2015 年11 月28 日14：30-16：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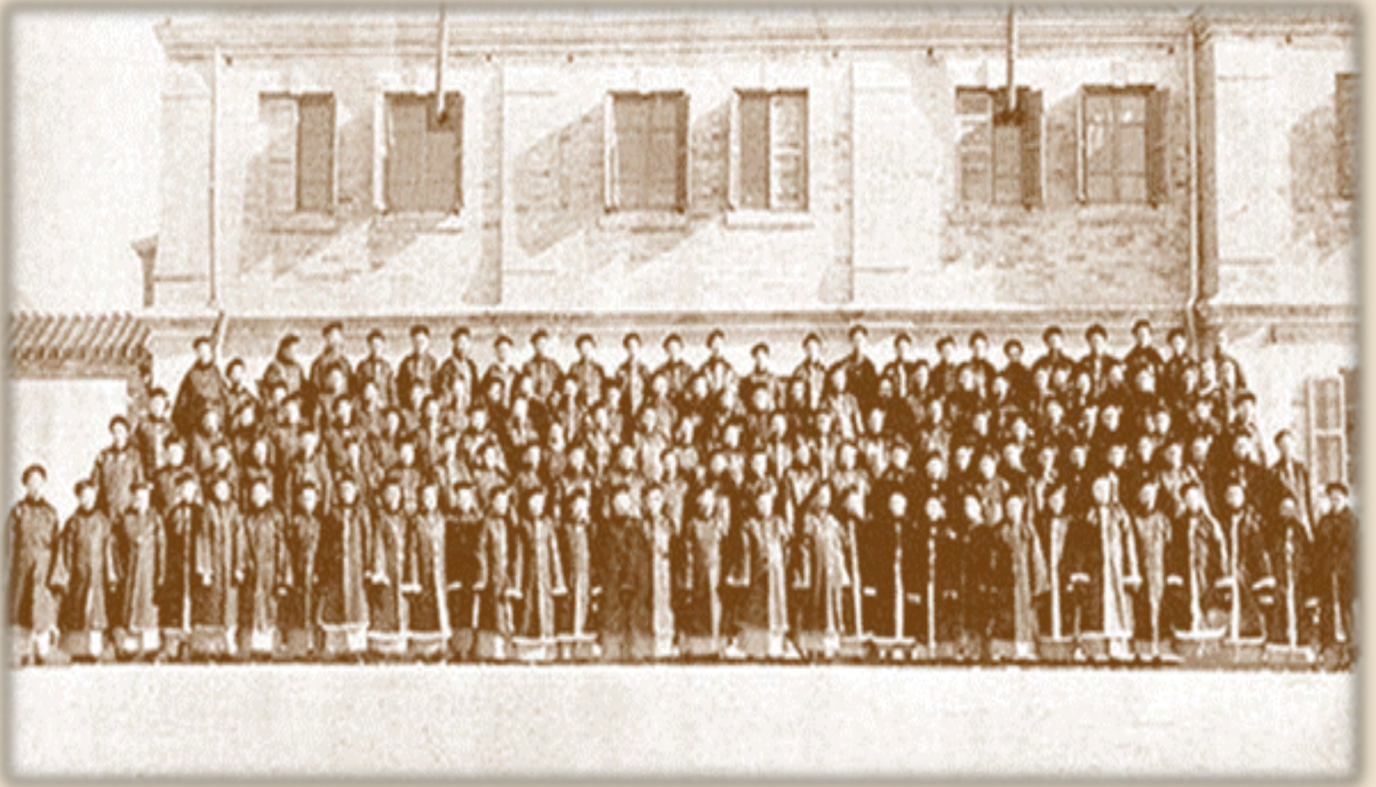
地点：彼岸书店·牡丹园店

嘉宾：

李炜光（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国川（知名财经媒体人）

主持人：纪彭（《国家人文历史》副主编、新知沙龙理事长）



（清朝资政院举行开院礼时的全体议员合影）

马国川：而且当时很多法律是直接 from 日本请来专家，直接帮他们制定的。

李炜光：是啊，我就知道谭嗣同他们直接进军机处，一天定100多条，非常有意思。大家看看那段历史，清政府也急了，因为各种改革都不灵活了，最后只能立宪了，立宪是宪政，清政府都能接受宪政，老佛爷天天也是说立宪，也是说这个，有很多的文献可以证明这个。

资政院1910年成立，1911年的立宪就是资政院审议的，而且审议的力度还相当大，把政府提出的、朝廷提出来的预算草案，砍了大致四分之一，这是现在人大都做不到的，确实是玩真的，虽然是体制内建的议会，而且它不叫议会，叫资政院。这种资政院一半是钦定的，一半是民选的，民选的还是真的是真选，很多民间的企业家，张謇不是都进去了，而且非常严格，民选的少一个，钦定的也必须少一个，必须要保证力量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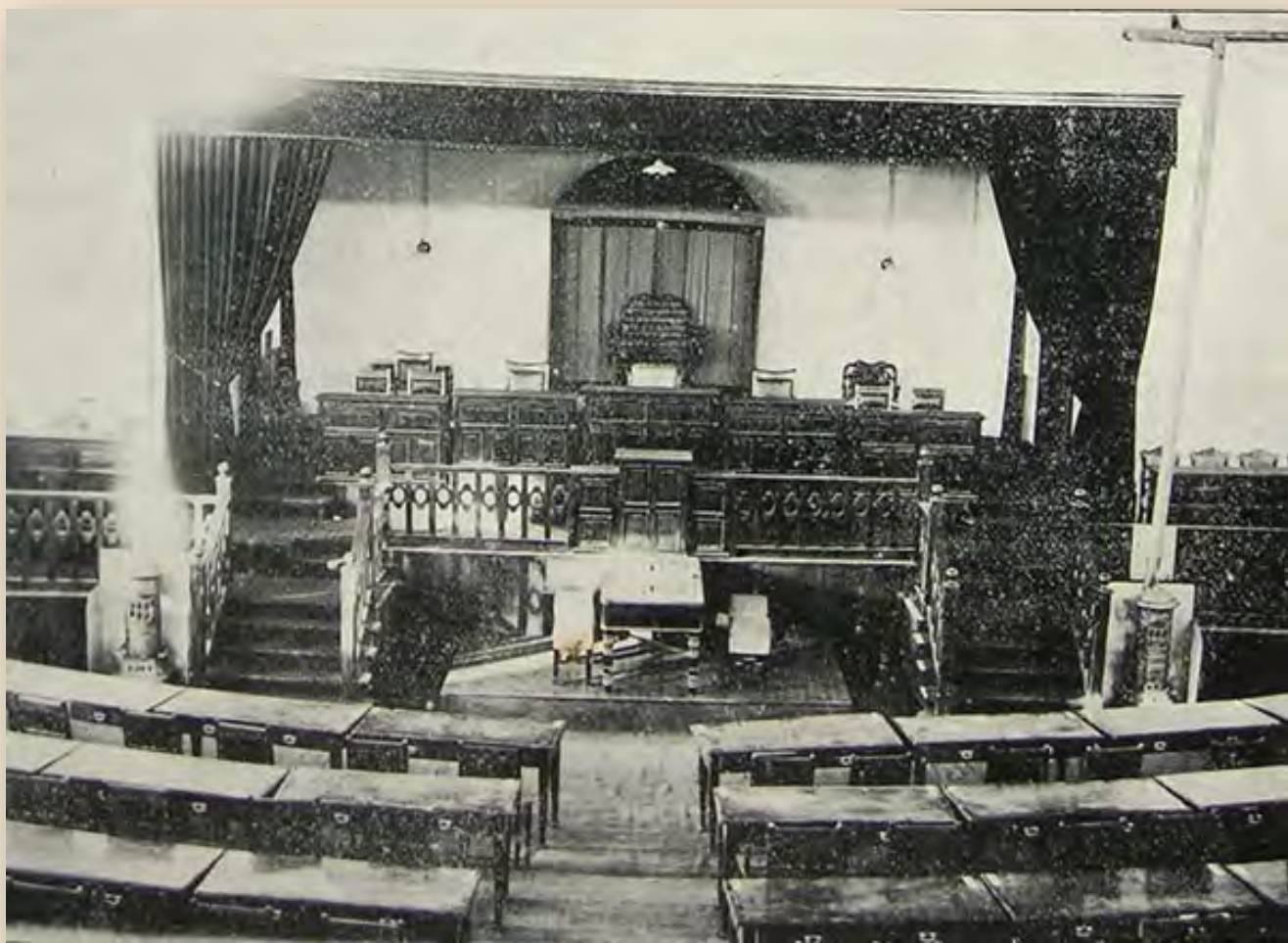
你说它慢吗？就那几年，中国，至少是秦以后2000多年没变过的制度，竟然就在那10年左右的时间，应该是从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跑出去又回来，决定要立宪，也就是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一点也不慢。而且中国是亚洲建立国会的第一个国家，资政院就是国会，日本都没有，中国的制度改革绝对是亚洲超前的，它着急了，要赶上列

强。在所有的立法当中，在19条立宪圣旨当中，后面2到3条说的就是财政。



（资政院外景）

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财政的汲取能力和皇权的效率是什么关系？其实清政府在没有发生立宪制之前，就意识到财政危机，当时采取的是一个很大的



（资政院内景）

行动，就是清理财政——它是叫整理财政还是叫清理财政？当时派出去的大臣是刚毅还是谁，是一个很有名的大臣，必须震得住地方，必须到地方巡视，欺瞒中央的、截留中央税收的必须清理出来。当然有时候还要以反腐败的名义，抓几个贪官出来。

说到贪官，在这里我插一句，咱们一般都说讨厌贪官反贪，大家读过《老残游记》，《老残游记》

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都反贪官，大家最该防范的其实是清官。这算咱们的一个思考题，为什么反清官，查一下这里头很有道理。

那次整理财政取得了微小的成果，并不是很成功，因为那个时候清政府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已经下降了。所以最后的立宪没有办法，什么招都使过了，地方上的那些大员，特别是清政府的那些大员，早期是张之洞那几位，后期是李鸿章，都是地方上非常有实力的，而且军队也在手里攥着，所以清政府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已经下降了。

马国川：当时就想让李鸿章当总统。李炜光：当时李鸿章在广东。对，我写过一篇文章，很长，叫《李鸿章是不是怀有二心》。就是说财政问题在当时关系到王朝的生死存亡，必然非常重视，可以高于一切事情，其他都可以商量，但是财政这个事情一定要加强集权。但是后来发现清理财政的效果并不好，地方可以不听它的，地方其实已经慢慢开始坐大了，财政问题怎么办？最后立宪可能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百度百科）

大家知道，当时某大臣去考察西方，回来给慈禧的建议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皇室将保留，该你的还是你的，你还叫皇上，该你税还给你，用法律规定下来，有多少税归皇室，有多少税归地方，用法律来规定，这就有点立宪的意思。而且实际上是对皇权征税的一个限制，就是说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是你的，没有那个道理，该归你的给你，规矩立下来。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制度转型的关口，迈过去中国就是一个宪政国家，迈不过去就爆发战争，打仗的高成本的那条路，那是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觉得100年前的事情，其实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开端。而且有些事情确实做成了，皇室妥协了，你们搞历史的都知道，后来不是皇室签订条例，该归你归你，实际上就是在解决它的权力边界。

但是中国的社会不是光资政院，或者是皇室逊位就能解决的，因为资政院这种改革缺乏社会根基，资政院本质上应该是一个代议机构，也就



（清末立宪运动时期官制改革后的官员）

是代表应该是真正选出来的，钦定的应该逐渐减少，应该全部是人民选出来的。选出来了以后，用立规则的形式来决定你怎么征税，还有你的权力怎么来配置，怎么定位的问题。所以它需要整个社会的全方位的转型和改革，这个就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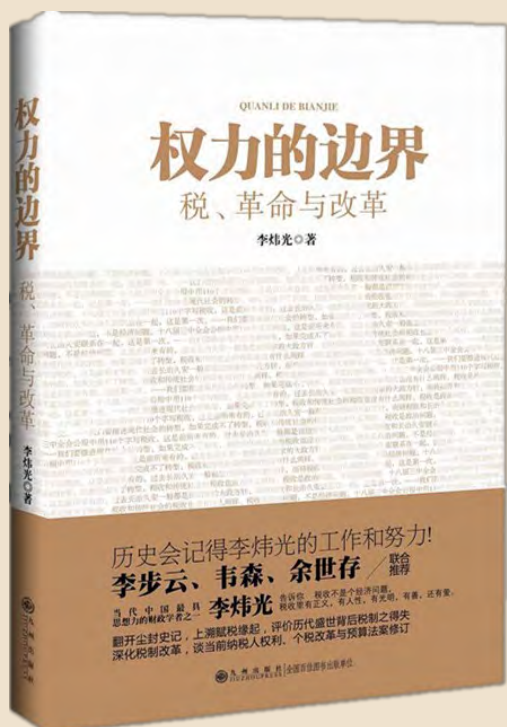
在这之后就是战争，因为立宪这条路没完全走通。从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一代一代在探索，死了多少人，很多人都付出了生命代价。

开始认为中国是技术不行，装备不行。后来打仗装备弄强了，甲午海战败的还很惨。后来谭嗣同、梁启超他们认为，中国是个制度问题，所以有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后又没成，后来又搞国会，国会也没成。后来的北洋也在搞国会，最后五四运动来了，五四运动中国人继续反思，闹了半天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中国的根子上，文化就有毛病。所以这样一代一代的探索，再往后就是连文化反思都没完成，五四运动不是搞了一半就停了？

在这以后就是战争，外来侵略，最后干脆自己打起来了。然后又搞了多少年苏联体制，根本走不到宪政这条路上来。再后来就是1949年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不用我再废话。你看大的历史观，中国的毛病出在哪？看看清楚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资政院最早建立，最早处理的问题就是预算问题。当清政府出现困难的时候，最早想办法清理的就是财政问题，都是在想办法自救，而自救就是改革的另外一个词，自救的很

大一个问题就是要把税收和预算问题落定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王朝才能稳固。所以实际上可能派生出纳税人这个群体，可能派生出来议会。所以真正的民主制度可能就是因为纳税同意不同意这个简单的问题所引起的。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现代民主国家，解决不了就是一个传统的制度，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而关于中国的这150年，我这书里有一篇文章《150年的转身》，原本是一个书评，发表在《读书》杂志上。那个就是在说150年都没转过身，所以它不止是清府的问题，还是现实的问题。就说这么多。▲



推荐阅读：《权力的边界》

作者：李炜光

出版：九州出版社

▼ 本书收录了李炜光先生近年来关于中国财税问题的论文和评论文章，反映了他近年来对中国财政制度改革和立法修法过程中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成果。





谈谈“民国那些人”

◎ 钱理群/文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蒋梦麟（前排左三）、梅贻琦（前排左五）与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今

天，我是来和大家一起读这本书的。最近出版的《民国那些人》，作者徐百柯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当编辑，他写这本书，是因感觉到自己，以及周围年轻人的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主要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于是，就想去看看“民国那些人”，当年那些大学里

的老师、学生，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求学、教书、治学，怎么工作，怎么为人、处世；他们追求什么，有什么理想，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范；对我们今天重建自己的生活、理想，有什么启示——我想，这些问题，也是在座的诸位想过，并且感兴趣的。

而“我”今天来领着“大家”一起读这本书，和“民国那些人”相会，这本身就有一个时空的交错，是很有意思的。“民国那些人”是上一世纪初，即“1900年后”的一代人；我出生在1939年，是“1930年后”一代人；而诸位则大多数是“1980年后”一代人。这三代人相遇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 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我们先来读这段话，它是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的：“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



（傅斯年与胡适、胡祖望合影）

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大学老师、学生、知识分子和历史上的大学老师、学生、知

识分子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民国那些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2.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我对当代大学生，也即所谓“80后一代人”的看法。我总是强调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要靠自己解决。但也总有学生对我说，我们也很想听听你作为一个年长者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

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 ▲



本文摘自：《民国风度》

作者：徐百柯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勾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戴乃迭：嫁给中国

◎ 李辉/文

这是一对堪称中西合璧的夫妻。在以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



（晚年杨宪益和戴乃迭）

这是一对堪称中西合璧的夫妻。在以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

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写的文字简秀。戴乃迭在努力融进中国。

戴乃迭的确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她与杨宪益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当然，也一同走进生活中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文革”中的经历。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宪益本人留学多年，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有着密切联系，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杨宪益与戴乃迭招致了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四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的时候，唯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最后竟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

他们却坚强地生存着。一同播种，一同收获，一同走过快乐与痛苦。

1937年，当戴乃迭走进牛津大学校园时，她再度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國身上。此时，距她离开中国



（中学时代的戴乃迭）

已整整十年。说实话，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戴乃迭只是好奇地注意到，面前这个年轻中



（杨宪益和戴乃迭）

国学生，眼睛细细的，一脸苍白，举止文绉绉，人显得颇有些拘泥。

不过，戴乃迭说，杨宪益对祖国的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当她到杨宪益房间去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杨宪益自己画的一张中国不同朝代区域划分的地图。戴乃迭结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确与众不

同。他懒散、贪玩、调皮，似乎诸事漫不经心；但他却又绝顶聪明，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竹林七贤恐怕是他最为倾慕的先贤。在戴乃迭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中，大概只有他身上最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吟诗，喜欢在酒中陶醉。这就难怪戴乃迭爱上了他。

戴乃迭晚年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说，她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虽是玩笑话，但也说明在戴乃迭眼里，两者之间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在他们结婚之后的漫长日子里，杨宪益身上的这一特点愈加突出，戴乃迭可以为自己的直觉和选择而满足。

那是值得留恋的日日夜夜。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杨宪益结识了戴乃迭，并且很快爱上了她。

说浪漫也很浪漫。爱玩、爱恶作剧的杨宪益，恐怕连自己也没有料到，在爱上了戴乃迭之后，人渐渐变得本分了许多。曾经尚未确定生活目标和学业方向的他，终于因为戴乃迭的出现，变得专注了许多。

回到文章的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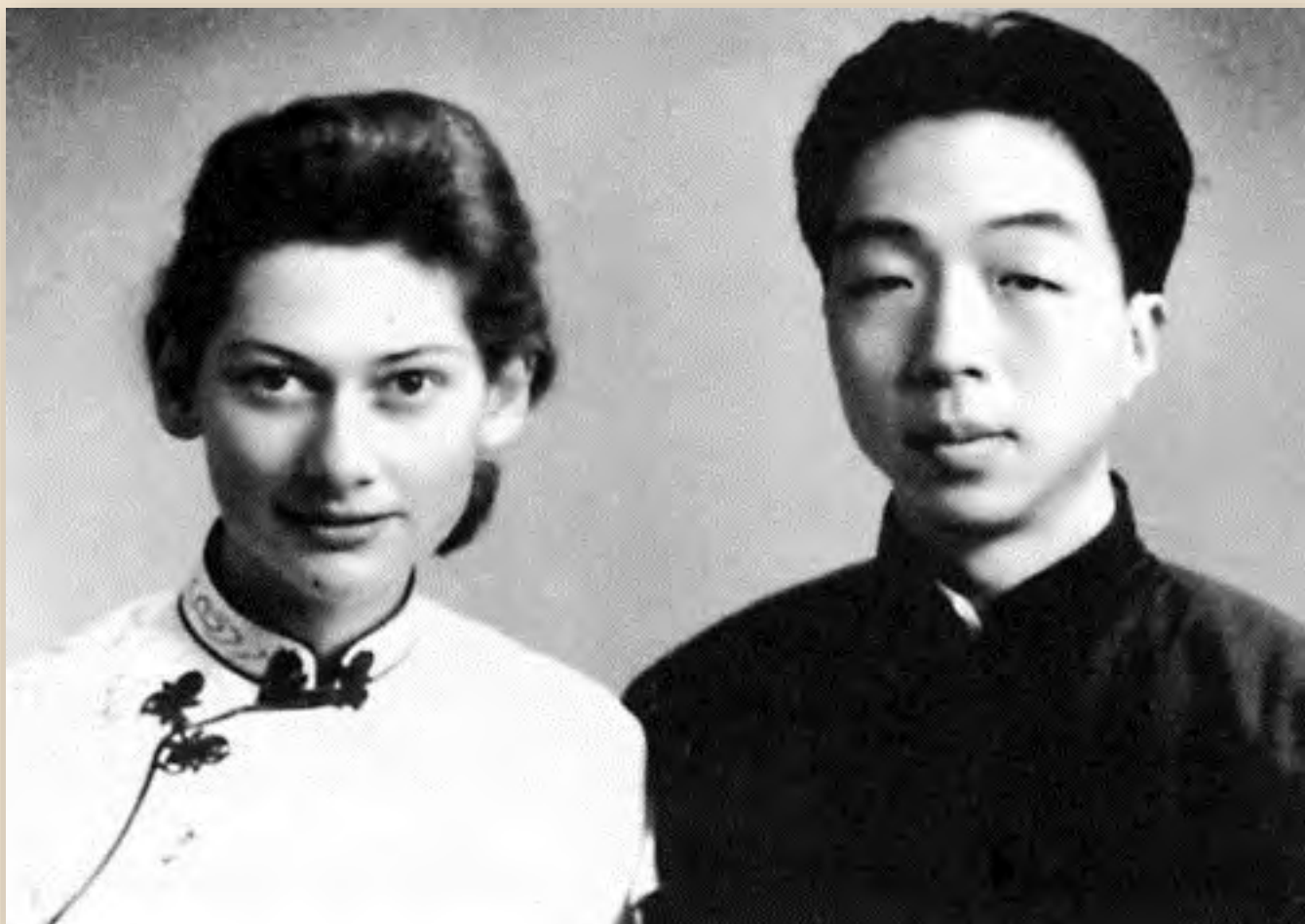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赵瑞蕻杨苡夫妇与战友萧亦五，于南京国立编译馆院内）

戴乃迭和杨宪益爱情关系一旦确定，阻力首先来自乃迭的母亲。

“母亲见到过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坚决反对我嫁给宪益，尽管我父亲认为，如果我们精神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可能美满。”戴乃迭回忆说。

母亲的反对无法动摇戴乃迭的决心。只是在年满二十一岁可以独立自主的年限之前，她还不能做出决断。她等待着那一天。

杨宪益也有他的顾虑。在他的眼里，美丽的戴乃迭本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而战火中的中国，却十分艰苦，如果和他结婚并一同回到中国，根本不可能保证起码的生活水准。他在乃迭面前，提到一首自己喜爱的摇篮曲，说乃迭这样的姑娘，本应过着歌曲中描述的生活：坐在垫子上缝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



所有的顾虑、迟疑、反对都没有改变戴乃迭重返中国的决心。她的心中，不仅仅有记忆中的快乐与多彩，不仅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让她迷恋的杨宪益。像她这样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姑娘，一旦确立了志向，她将终生不渝。不管人生旅途前面会发生什么，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1940年，盼望回国已久的杨宪益，带着同样热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戴乃迭，登上前往东方的海轮。

离开英国之前，在申请护照时，戴乃迭遇到了负责颁发护照的官员的充满疑虑的询问。

谈到关于前往中国的目的，戴乃迭对颁发护照的官员说：“我有一份在中国的大学教书的合同。”

“你不要相信中国的合同。最终我们会不得不花政府的钱去帮你回国。”那个官员说。

“我和一个中国人订了婚，我们会一起去。”

“你会发现他早已有了两个老婆。我们最后还是不得不花政府的钱帮你回国。”

这时，戴乃迭为了让官员相信自己的确有能力在中国生存，只好搬出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父亲来作后盾。他当时正在中国参与他发起的工业合作社工作。她说：“我父亲现在在工合组织工作。”

“哦，这样情况倒不一样。”

终于说服了护照官员。也许这个官员的忧虑有他的理由，他显然处理过一些棘手的案例。因此，他的

担忧和疑虑可能出于善意，是对自己同胞未来命运的关心。但是，他不可能理解戴乃迭，更不可能理解她与杨宪益之间坚实的爱情基础。一旦她做出了选择，她会执着地走下去。后来的生活道路证实了这一点。哪怕从踏上战争中的中国土地的那天起，她就开始经历种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但她始终没有怨言。她所追求的、她所满足的是与杨宪益之间的心心相印和相濡以沫。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渐渐凸现出来。然而，一生中最为严峻的磨难与考验，在二十几年后的“文革”期间在他们身上降临。 ▲



书中所写的这些人物，从胡风、冯雪峰、巴金、萧乾、赵树理，到丁聪、吴冠中、王世襄、黄苗子、郁风等，个别人在大时代中被吞噬，大部分则乐观、坚韧甚至委曲求全地挺了过来，从而他们才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文化创造的可能。

摘自：《旧梦重温时》

作者：李辉 九州出版社







大时代下的小背景

◎ 惠心一笑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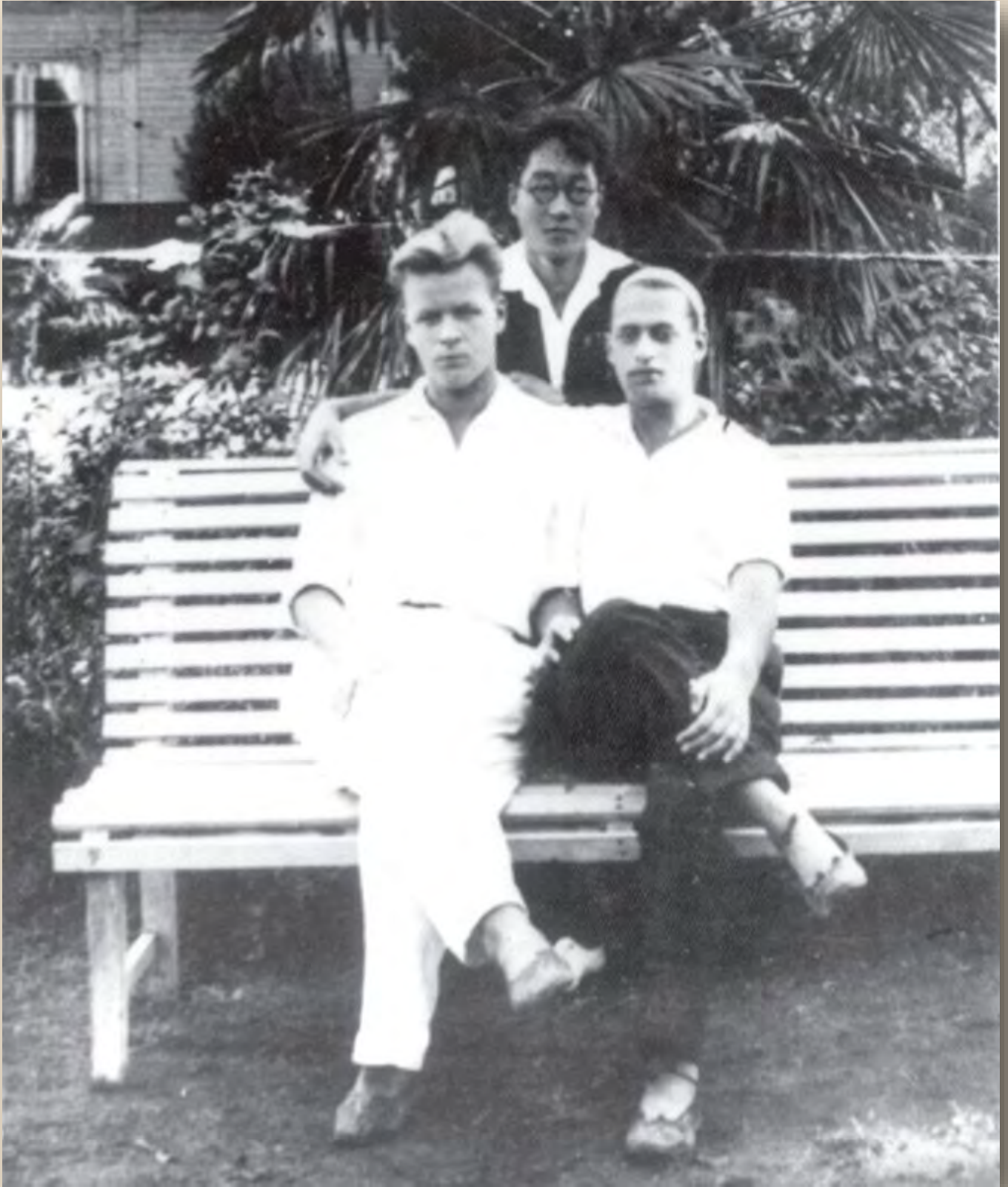
师哲作为俄文翻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八年之久，亲历和见证了延安整风肃反、国共谈判、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等重大历史阶段。



（1928 年，师哲在莫斯科）

人物传记和回忆录类书籍一直是我阅读的兴趣点。阅读的主产品就是从主人公的经历中揣摩其成长历程、内心情怀，副产品是随便管窥时代一角，进而沉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

虽然知道许多回忆录或者传记有不实的成份，或曲笔美化自己，或夹杂了其未必正确的观点，但我深信在纷繁世事的背后，人性是相通



（1930 年，师哲和同事在黑海疗养院）

的，性格决定人生、时代影响命运，也是现实中屡屡应验的定律。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由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成书，作为一本大部头的党史类书籍，平心而论阅读范围应是小众化、学术圈子化的。但其多次增补修订发行，顽强地活在当下的出版丛林中。在这个微信微博大行其道，碎片化阅读触手可及的情况下，一本貌似小众化的书，能有这样的命运确实不易。这是引起我阅读兴趣的起点。

1920年代的中国是个沸腾的大时代，尽管那段历史已经渐行渐远、面目模糊，但许多时代人物、历史事件仍然是当下书籍报刊、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师哲和那些如雷贯耳的大人物比起来，不怎么有名气，也不那么耀眼。如果借用今天划分一、二、三线城市的做法，师哲应属于二线人物吧，这样划分也许不妥当，但容易让更多读者增加对那段历史的感性认识。



（1949年，在西柏坡。图中右起为毛泽东、师哲、米高扬、伊万·科瓦廖夫）

师哲在苏联学习工作十五年，从首都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开拓期的县城，再回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对于苏联有着极其深入的认识。今天的俄罗斯，在国际上扮演着硬汉角色，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重要邻邦。但其前身苏联是什么样子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苏关系等等，这些小时候比较面熟眼熟的名称，

这些历史教科书中一闪而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怎样的前世今生？历史教科书也许展现了宏大的画卷，回忆录更像一幅幅细致入微的工笔画，生动细腻，有血有肉，让那个大时代多了一份小人物的情怀和温情。

从1940年初回国在延安工作，至1957年离开中央到地方工作，师哲作为俄文翻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八年之久，亲历和见证了延安整风肃反、国共谈判、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等重大历史阶段。读这本书，除了条分缕析地认识那段历史外，还提供了从另一个切面认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张闻天等人物的可能。正如作者张海文所言“我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他们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

书中有些关于老一辈领导人的回忆，其视角确与以往有所不同。一般的书有十年寿命就很不错，而师哲回忆录经过近二十年的考验，已然成为历史文献、成为经典、成为研究历史必备的参



（1946年 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的合影）

考书。这也许是其视角独特、不同与其他史料或者传记的原因吧。书中有大量生动翔实的细节、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节点。比如：

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出现在篮球场上，和同志们打篮球；

江青第一次到主席那儿，主席望望她说：

“你能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可以管生活、家务”

“你能负担的起吗？”主席又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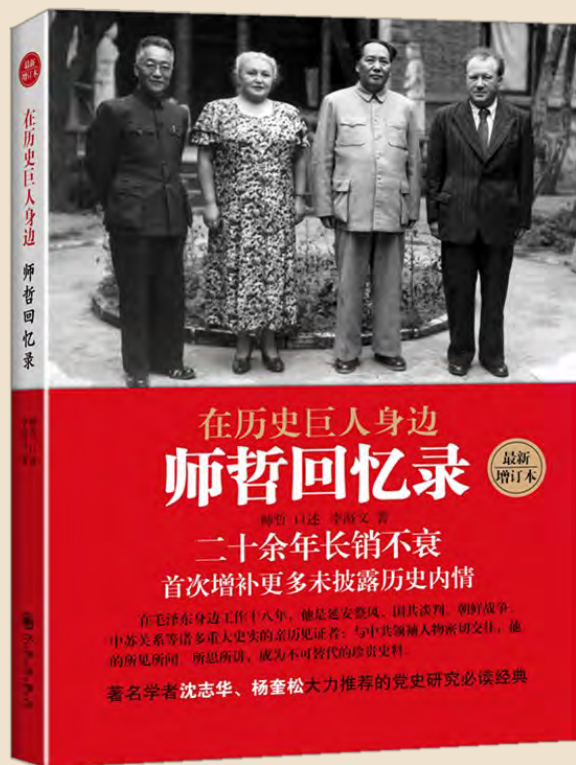
“能，试试看”。

还有一些题外话。这两年，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硬起手腕、持之以恒开展整顿作风活动，并印发了几代领导人有关作风建设的论述资料汇编，看着权威有余，生动不足。在师哲回忆录许多章节的字里行间中，不断读到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深入群众、勤勉敬业的片段，却少有突兀之感。相信文字背后是回忆者融入血脉的信念与信仰，进而形成的思维行动习惯，而这些正是当下最稀缺的软实力。每每至此，掩卷唏嘘不已。

作为一名历史的旁观者，透过那些照片和文字，回望那段历史的背影，还是一如既往的感慨。师哲本人命途多桀。在异国他乡的十五年中，西伯利亚的酷寒艰苦，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纷繁复杂，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师哲；在高层身边

的十八年中，虽是荣耀备至，但也步步惊心，并留下隐患，最终遭到关押、审查、流放达十九年。很难想象，从主席的心腹红人到秦城监狱“6601”号囚犯，师哲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思索、忍耐、坚持，但他最终战胜了苦难，可以自豪地以精神财富的方式，解析苦难，笑傲命运。

如此说来，“站在历史巨人身边”，究竟是福兮祸兮，还是命哉运哉？ ▲



推荐阅读：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口述：师哲 作者：李海文

▼ 师哲亲历了中苏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诸多重大事件。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本人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



第一品 黑人牙膏

阿墨木

溫酒新藥 (除根利便)

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定於本月三十日召開股東大會，敬請各位股東屆時出席。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公司辦事處。



為求 吸者 滿意 儘量 提高 品質

聯合牌香煙

名煙出產 品質精良 售價低廉 到處歡迎



大公報

Ta-Kung-Pao

天津 Tientsin 天

大誠金人日登

號十二百七千五第

號一四二第報新張一第

無接洽病醫心腦血新

平壓血

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 徐百柯 /文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被

《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的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麦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前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1941年，日军对

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王云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中国新闻家，政论家。）

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他来看看我们的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我们

在割稻子》。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高层。蒋介石唁电称：“季鸾先



（蒋介石率治丧委员会诸先生致祭）

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肋积粹，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



（张季鸾之墓）

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季鸾先生，文坛巨臂，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亲往丧礼吊奠。

张季鸾的灵柩后安葬于西安，碑铭中对他的定位也许是遵循他遗嘱之意，异常简略，并未“呼应”他身后的极尽哀荣，仅曰：“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

王芝琛告诉记者，他听说，这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碎块。

张季鸾的侄儿，《大公报》名记者高集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真正的报人。”

这个报人，1913年初创立北京《大公报》，该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借大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被投入监狱。

这个报人，1918年担任《中华民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这个报人，1925年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友人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最后，这个报人和吴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大公报》资料图)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

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职务之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

本文摘自：《民国风度》

作者：徐百柯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 本书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他们是故去的名校校长，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



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马上赋诗的将军……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秩事。



《赛德克·巴莱》讲的是什

◎ 亢霖 /文

在一般史书里，“雾社事件”被记述为少数民族泰雅族人对日本殖民者的反抗，赛德克族被视为泰雅族的一支。

赛

德克·巴莱 的意译是“赛德克，成为真正的人”，赛德克是族名。读过这本书前面的内容，会了解台湾少数民族的族群细分比较复杂。在一般史书里，“雾社事件”被记述为少数民族泰雅族人对日本殖民者的反抗，赛德克族被视为泰雅族的一支。但赛德克族一直强调自己的独特属性，在历史上，赛德克族也跟其他泰雅族人有不少纠葛恩怨。

1915之后，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铁腕弹压下，台湾岛内不再有大规模的武装反抗了，1930年的“雾社事件”成为平静中突然出现的大地震。少数民族当主角，跟1915年前以汉人为主体的反抗相比，色彩独特。雾社是中台湾一带的泰雅族（含赛德克族）少数民族部落，莫那·鲁道是其中一支马赫坡社的头领。尽管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思维跟汉人不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同一。

此前，日本殖民者多年推行针对少数民族的“理蕃政策”，山里的资源要，少数民族的劳动力也不放过。雾社民众的劳役重，工资低，还总被日



(《赛德克·巴莱》剧照)



（《赛德克·巴莱》剧照）

本警察赖账。为了深入统治台湾，当局鼓励日本警察与少数民族部落头领或有地位的家族通婚，有的警察在日本有妻室，到台湾后又娶少数民族女子为妻，一旦返回日本就将其遗弃，造成一幕幕人伦悲剧。莫那·鲁道的妹妹就这样嫁给了日本巡查，又



（ 1930年在日治台湾发生的原住民抗暴事件“雾社事件”资料图片）



（《赛德克·巴莱》剧照）

被抛弃，地位尊贵的女子遭遇如此命运，族人愤恨难言。

导火索是一场婚宴，在莫那·鲁道家中举行。日本警察吉村恰巧经过，莫那·鲁道的儿子塔达欧请他入内敬酒，傲慢的吉村嫌塔达欧手脏，不愿受酒，并用手杖敲打他的手，双方发生口角。次日，塔达欧携酒前往警所赔罪，吉村不予理睬。族人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又害怕日本人会报复，终于由莫那·鲁道决策先发制人，起事反抗。莫那·鲁道

除率领马赫坡社外，还说服了雾社中的斯克社、塔罗湾社等一道参加。

1930年10月27日，日本人正在雾社公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少数民族青年突然闯入，首先砍落日本“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颅，随后一拥而入，将在场日本人砍杀一尽。莫那·鲁道本人率众分袭日本警察宿舍、邮政局、商店，并切断电话线。日本



（“雾社事件”中被杀死的日本人的家属，捧着骨灰走向灵堂）

殖民当局迅即从台北、新竹等地调动大批军警进攻雾社，反抗者退入山中岩窟。日本军警用炮轰，用飞机轰炸，甚至违反国际公约投掷毒瓦斯，还挑唆分化，组织与莫那·鲁道等人有恩怨的其他少数民族部落进攻反抗。在电影《赛德克·巴莱》里，少数民族彼此间生死缠斗情节没有被回避，成了日后对这段历史产生分歧的重点。

眼看大势已去，莫那·鲁道和追随者一道先杀死家眷，后自杀。许多少数民族妇女、小孩集体自缢身死。一种说法是，他们的自杀是为了激励夫婿父兄的意志，使战斗者没有后顾之忧。

殖民当局强调有一百多名日本人被杀死，为此毫不动留情地挥动屠刀。在随后的五十多天里，参加反抗的几个少数民族社群人口由原来的一千四百多人减少到五百多人。1931年，日警又挑唆亲日的少数民族突袭，制造“第二次雾社事件”，又有两百多人遇害。剩余两百多人被强迫移居，离开故土，历经的苦难不仅是普通的家破人亡。



日本人也要追究管理失当的问题，检讨“理蕃政策”，时任总督石塚英藏于1931年引咎辞职。在日本人的检讨里，“人心”肯定是个重点。

厘清事件的轮廓不难，难以言喻的是人心。莫那·鲁道并非闭塞山中的老头领，他到过日本，深知以少数民族的力量无法对抗近代化殖民体制。日本人也曾在当地努力推行“文明教化”，还培养出两个起了日本名字的少数民族“楷模青年”花岗一

郎、花岗二郎，但两个从外表到生活已经高度日本化的年轻人在事件发生后自杀了，还留下遗书，表明与部族共进退的心迹。从头到尾，莫那·鲁道和“雾社事件”反抗者们是求死而非求胜，以死来“成为真正的人”，体现着电影《赛德克·巴莱》力推的一句主题：“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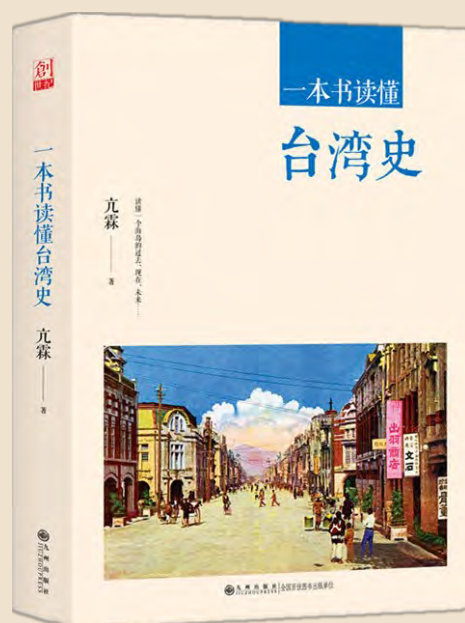
日本人确实在富国强兵的近代化进程上先走一步，但在中国人记忆里，没有比日本侵略者的行径更野蛮的，可见文明和野蛮是相对的。莫那·鲁道们的反抗跟蒋渭水、林献堂们的反抗动机也许不尽相同，但既然在同一片土地上面对同样的压迫者，少数民族和汉人有着命运的交集。 ▲



这是一部由资深驻台记者写出的历史随笔集，所有的随笔联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台湾史。

摘自：《一本书读懂台湾史》

作者：亢霖 九州出版社出版





你为什么想要去讲他人的闲话？

◎ 克里希那穆提 /文

关系犹如一面镜子，从中你可以不断地审视自我，既有开心的也有让人不开心的你自己的模样。

问：是什么使得我去说别人的闲言碎语的呢？
我是在道出真相还是在说他人的是非？只要所言属



（曾被《纽约时报》誉为“本世纪最受欢迎的艺术家”
诺曼·洛克威尔的作品——《爱说闲话的人》）

实，就可以讲别人的闲话了吗？

克：在这个问题背后，蕴含着许多东西。首先，你为什么想要去议论他人呢？动机何在，是什

么驱使你去做这么做的？探明这个更为重要。

你必须知道你所说的关于他人的事情是否属实。你为什么想要去讲他人的闲话？假如你怀有敌意，那么你的动机就是建立在暴力、仇恨之上，于是注定会是邪恶的，你的意图是通过你的话语或者你的表述给他人带来痛苦。

你为什么要去谈论别人呢，为什么要去说别人的是非？是什么使得你必须去议论他人的呢？

首先，这难道不表明你的心灵是肤浅而琐屑的吗？如果你真的关心某个事物，真的对其感兴趣，你应当懂得谈论他人的时机，不管此人可能是多么的良善、高尚，抑或是多么的愚蠢和没有责任感。一个愚蠢或浅薄的心灵总是会希望去谈论些什么，希望去嚼舌头或者激动不安，一定要么去阅读，去要求什么，或者去相信什么，你知道这种让自己忙忙碌碌的行为。尔后便会出现如下问题：我怎样才能停止去议论别人？

爱讲闲话的人与他所谈论的内容，关于他人的是非，这二者跟另外一个人都有一种关系，他与他



的听众之间有一种相互的愉悦，一个讲，一个听。我认为，探明动机十分重要，而不是怎样才可以停止这种议论他人的行为。

假如你能够找到动机，不停地、直接地审视它，既不去谴责也不去辩护，那么或许你的心灵就会开始发现更加深刻的层面，从而使得你停止这种议论别人的行为。然而，发现这种动机、这种推动力却是一项格外艰难的任务，对吗？

首先，一个忙于讲闲话的男人或女人是如此热衷于

谈论他人的是非，以至于他或她没有时间去思考。毕竟，闲言碎语是自知的一种方式，不是吗？假如你残忍地谈论别人，这表明了敌意、憎恨。由于你不想去直面自己的敌意和仇恨，于是你通过谈话去逃避，若你说他人的闲话，这是另外一种逃避你自己的方式。

如果一个人真的希望认识生活的全部，那么他就应该怀有对自我的深刻认知——不是你从书本那里获得的知识，而是通过关系获得的直接的认知。关系犹如一面镜子，从中你可以不断地审视自我，既有开心的也有让人不开心的你自己的模样。但这需要你抱持认真而热切的态度。很少人是严肃认真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琐碎的、愚蠢的。 ▲

摘自：《让心入静》

作者：克里希那穆提

出版：九州出版社

本书是《克里希那穆提集》的第六本，收录了克里希那穆提1949—1952年在世界各地所做的演讲和讨论。





立冬篇·第38期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唐文洁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阅读：当当读书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6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

讀享 
JIUZHOU PRESS

立冬

